跨文化语境下的“表演”:叶君健的外语创作

倪婷婷

摘 要: 叶君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选择用世界语、英语创作,这种跨文化语境的写作决定了《山村》等小说对“他者”视界的融合,而叶君健对这种写作的“表演”特性有清醒认知。由于受到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第二代成员的影响,《山村》等小说创作成为叶君健保卫人类文明和民主的一种实践。借助于跨文化语境的“表演”,叶君健的外语作品实现了向世界传递中国人呼声的意图,也为读者提供了从中寻觅文化、政治、审美新的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 叶君健;《山村》;“表演”;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18)01-0132-09

1981 年 7 月 10 日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发表了当时英国很活跃的作家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的一篇文章,着重介绍叶君健和英国文坛的关系:“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片段在叶君健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了”,“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的那几年间,他成为了布隆斯伯里和剑桥一位人所熟知的作家。就是在剑桥,他用英文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成为好几个刊物的撰稿人”。[①]斯卡梅尔对一个叫 Chun-Chan Yeh 的中国作家数十年前的英语作品津津乐道,且将其视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片段,这既是对叶君健创作实力的肯定,也是对叶君健作为一个英语作家的认可。而其实叶君健也是一位世界语作家,30 年代他在国内时曾以马耳(Cicio Mar)为笔名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这部世界语小说集“在日本和国际世界语读者中引起过较广泛的注意”[②]。1944 年叶君健到英国后改用英文讲述中国人的故事,除了战时的数百场演讲,战

收稿日期:2017-10-07
作者简介:倪婷婷,女,江苏如东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46)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论”(13JJD750009)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英]迈克尔·斯卡梅尔:《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邵鹏健、李君维译,《读书》,1982 年第 5 期。

② 叶君健:《从〈岁暮〉开始的创作道路》,《叶君健小说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57 页。

后他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蓝蓝的低山区》(*The Blue Valley*)、长篇小说《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雁南飞》(*They Fly South*)等,这些英语作品使叶君健名正言顺地跻身英国文坛,其中的《山村》被译成各种文字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与叶君健相交颇深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2004年回顾叶君健的文学生涯时说:“他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用中文、英文和世界语三种文字发表文学创作,用十多种文字进行文学翻译的作家和翻译家。”①爱泼斯坦肯定了叶君健多方面的文学贡献,同时也提示了叶君健小说多重的语言文化背景。

叶君健1949年回国后主要用中文写作,晚年除了撰写《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的后两部外,还创作了《土地》三部曲等小说和散文作品。由于叶君健大多数中文长篇接续了他早年外语作品对近现代中国乡村题材的偏好,像《寂静的群山》后两部虽然与第一部《山村》问世相隔40余年,而且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媒介,但由于这三部长篇在人物和情节设置上与《山村》具有连贯性,加上晚年的叶君健再三强调他不同阶段的中外文小说均来自最初的同一个整体构思②,因此对国内读者来说,解读包括《山村》在内的叶君健的外语作品时,很自然地就将它们和作家晚年的中文长篇一起等量齐观,但其结果是往往模糊了叶君健外语创作的本来面目,作家前后期创作、域内域外创作、中文外文创作之间存有的差异性也不同程度地被忽略了。90年代的一些研究者更是习惯地将《山村》放在《寂寞的群山》和《土地》两个三部曲的框架中讨论,从“生动地再现了半个世纪中国人民的奋斗业绩和精神风貌”的角度,得出它们是“弘扬主旋律的史诗式的力作”的结论③。这种攀附“主旋律”的评价,如果说尚适用于作家晚年创作的那几部长篇的话,那么,就《山村》而言,显然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文本事实,更未必是一种赞誉。虽说叶君健本人自始至终确实重视政治和道德的意图,但用90年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尺度去裁量叶君健40年代在英国创作的外语小说,未免方枘圆凿。对《山村》等外语小说意义及价值的定位,若过滤掉文本生成的跨文化语境,其实是很难恰如其分的。

一

一个作家不使用母语表达,即意味着放弃语言本能的陪伴。脱离了文化和思维舒适区的过程,无任何有机性可言,对此叶君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1991年叶君健在回忆二战结束前他在英国的第一次演讲时说:“虽然我在大学讲过课,但我从未在公众面前作过报告——而且对象还是英国公众,用的又是英语。……这次表演的结果,坐在一个角落里旁听的战时宣传部的有关工作人员表示满意。我得马上开始正式下去到各地作‘表演’。”④叶君健用“表演”来指代他在英国各地超过600场的巡回演讲,并非偶然。他当时还自嘲自己是“一个来自东方的魔术师”,他在演讲旅途中一直随身携带一小手提箱和黑雨伞,那副宛若英人的尊容让他自己也感到些许滑稽,而用英文所进行的那些演讲,在他心里更如同魔术般的“表演”。无论作为90年代的回忆者,还是40年代的当事人,叶君健不乏明确的身份意识:即便受命于英国战时宣传部,即便面对的是英国受众,且用英文表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中国人,而他讲述的

① 爱泼斯坦:《寂静的群山·序一》,《叶君健全集》第1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② 叶君健在《关于〈寂静的群山〉》一文中说:“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也就是在30年代初期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就酝酿写几部长篇小说,反映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故乡所目睹和经历过的社会动乱。”在《关于〈土地〉三部曲》一文中,又表示:“《土地》三部曲,从写作时间上讲,晚于《寂静的群山》三部曲,但从内容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则先于后者。它们是‘姊妹篇’,为一个整体。我最初也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思的。”(《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76页)叶君健在《我的故乡——红安》一文中说:红安人民创造的革命业绩,“对我个人说来成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灵感。我曾经根据这里人民斗争的史实写过好几部长篇小说。其中名为《山村》的一部甚至流传到了极辽远的冰岛”(《东方之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③ 李保初:《日出山花红胜火——论叶君健的创作与翻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④ 叶君健:《去国行》,《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题目也大多不外乎《中国人民的战时生活》之类。在这个前提下,叶君健扮演了一个向英国人介绍中国的角色。作为表达工具的英文,是叶君健这个“魔术师”的神奇斗篷,也是角色面具;而那些英国听众,正是推动这些“表演”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毕竟表演离不开表演者与接受者的接触和互动。叶君健谈到当年在演讲中要阐释自己的观点时,就特别注意表现方式与惯常“有所不同,得让英国听众能够接受”。这种对自我角色和受众反应的双重自觉,其实也同样体现在叶君健的外语写作过程中,而事实上,他在演讲同时以及稍后在剑桥用英语书写的多部(篇)小说,也正是他履行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解释中国这一职责的延续。因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叶君健的外语创作,甚至包括之前在中国用世界语创作的那些短篇,均不无“表演”的特性,而这一特性恰恰标示出叶君健的外语创作与他 1949 年后中文写作的分野。

借用叶君健对自己用英语向英国听众做战时演讲的比喻,将叶君健的外语创作视为“表演”,不含任何贬低之意。相对于他以后用母语写的那些小说,他以“表演”的态度创作的外语作品,其实反倒更具魅力。从艺术形式的角度看,表演的最高境界是角色塑造和情感传达的完美化。作为一个“表演”者,叶君健必须逐渐习惯在戏剧化情境中切换身份,并学会在扮演和被扮演的关系中自如穿梭,有效地进入向特定的受众传情达意的境界。他当年动笔写《山村》的时候就有非常明确的意识:“我得把中国的形象——而且是农民的形象——移植到英语这种文字中去,既要生动活泼,又要读起来有一定的节奏,像较高级的英文文学作品——这也就是说它的文字得有一定的风格,使严肃的文艺评论家乐于在严肃的报刊上写评论。”叶君健很清楚,要达至这一目的,决非易事,毕竟风格“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与个人的气质、文化修养和文学修养有关。它不单纯是英文本身的问题,也有中文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人”,叶君健希望自己写出“既要具有个人特色,又能表现出中国文化的修养,而读起来又要使人感到它是文学英文”的作品。[①] 从中可见,叶君健努力地在“表演”者的“我”(创作主体)与所塑造的角色的“我”(“魔术师”形象)之间寻找一种协调,尽可能在双重自我的平衡中完成真实、可信且具个性特色的表演。叶君健不奢望他的英语小说会成为英国读者“习惯性的英语”文本,因为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他的中国文化修养自然地会参与到创作过程中,并为它们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这也是叶君健凭借对自身经验、知识、技巧和控制力的自信,力图提供给他的英语读者生动活泼和新鲜感的所在。

《山村》式的写作策略实际上贯穿了叶君健所有的外语作品。对叶君健来说,选择用外语书写,就意味着选择了外语读者。既然是向西方人讲述故事,那么,故事的好坏也就主要取决于西方读者的评价。尽管叶君健讲述的大多是中国的故事,而且也有意识地要将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作为创作的底色,但毕竟只要面对外语受众,他讲故事的方式和立场都会受到牵制和影响。叶君健不得不融合“他者的视界”来进行自我言说,这是挑战,也是宿命。叶君健对外语读者的接受预期以及自身的情感表达、职责使命均有着清醒的自觉。

1932 年寒假期间,还是武汉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的叶君健用世界语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说《岁暮》(Je La Jarfino)。为什么用世界语写作,对此叶君健解释说,作为身处大城市的青年,他感到苦恼和压抑,乡村体验和认识激发了他表达的欲望,他要让“世界的人民,特别是被压迫的人民”,听到那些被人遗忘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呼声,而“世界语是弱小民族文学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②] 因此,包括《岁暮》在内的世界语短篇集《被遗忘的人们》中的小说,大多叙写了中国底层的一些小人物的生活。叶君健认为,那些在灰色的无出路的生活困境中挣扎的中国人的故事,会引发世界上其他有着相同命运的人的共鸣,这样,在人类历史上,中国那些“被遗忘的人们”也就留下了记录。所以,《被遗忘的人们》是年轻的叶君健被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相互了解的世界语理想所感召的结果,既是为自己和那些

① 叶君健:《在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剑桥》,《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 3 期。

② 叶君健:《从〈岁暮〉开始的创作道路》,《叶君健小说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58 页。

被遗忘的同胞写的,也是为“世界的人民”而写的。他对这种人造的国际语的热衷,凸显了他不同寻常的国际视野和人类立场。尽管《岁暮》不过是叶君健的处女作,但他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将中国人的情感命运与“世界的人民”相联系,并确定了此后外文写作的方向和基调。40 年代客居英国的叶君健改用英文回望中国故土,除了相似的纾解乡愁外,目的也“始终是一致的: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命运”①。《山村》等英文创作一方面完成了跨文化语境下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形塑;另一方面,那些中国人的故事也丰富了人类生存发展理念的意义价值。

二

与三四十年代旅居英国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作家如熊式一、蒋彝、萧乾一样,叶君健的英语创作始终伴随着英国文化界的关注。尤其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②成员的联系,成为叶君健英文创作不可忽略的背景。

80 年代以后叶君健不止一次地提及他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的接触:“我与‘布隆斯伯里学派’的交往源于第二代诗人朱理安·贝尔(Julian Bell)。他原是 1935 年中英庚款委员会送到武汉大学外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在英国诗坛属‘现代派’,很有声望,出过好几本诗集。我那时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外国文学,他教现代诗和散文,我们逐渐成了很要好的朋友。”③朱理安·贝尔的名字在叶君健晚年的回忆中反复被提起:他是“当时在学校最了解我的一位教授”④,他是“‘意识流’大师维吉妮娅·沃尔夫的侄甥。但因为时代不同,他在思想上和这个学派的人物又有所不同。他的思想激进”,此后不久牺牲在西班牙内战反法西斯前线。⑤ 对政治和诗投注了同样热情的贝尔与他的中国学生叶君健惺惺相惜,“他们两人之间的共同点是左翼政治观点”⑥。对叶君健来说,尤为关键的是,贝尔充当了他进入英国文学圈的铺路人。因为贝尔的介绍,在叶君健赴英之前的几年,他就结识了英国新派文学刊物《新作品》(New Writing)的编辑,并在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⑦;而叶君健开始与贝尔母亲著名画家瓦涅莎·贝尔通信、之后与贝尔家族及其经常来往的朋友建立友谊,则无疑更要归功于贝尔的生前引荐和身后作为情感纽带的推动。

贝尔在写给母亲和朋友的信里,称叶君健是个最有希望的作家,是“他最喜爱的一名学生”,说叶君健“出身于偏远山区……比起其他人,他十分活跃、警醒和健谈”,还“经常提及叶君健的魅力、聪明和招人喜爱”。⑧ 在之后来到中国与叶君健有过接触的英国诗人 W. H. 奥登(Wystan Hugh Auden)和作家克里斯托夫·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印象里,叶君健“是个腼腆的年轻人”,和蔼可亲;他用世

---

① 叶君健:《从〈岁暮〉开始的创作道路》,《叶君健小说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59 页。

②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 20 世纪上半叶由一些英国的文化精英组成的松散团体,其成员有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画家瓦内萨·贝尔、邓肯·格朗特,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汉学家阿瑟·韦利、罗杰·弗莱,翻译家康士坦斯·加奈特,出版家伦纳德·伍尔夫,还有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等。其核心人物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及其画家姐姐瓦内萨·贝尔。这个团体中大多数人均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而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则是对生活的共同态度和实践。他们声称:生活的首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及对知识的追求。这个团体的第二代如诗人朱理安·贝尔等在继承了父辈自由主义立场和反叛的气质外,更倾向于投入捍卫民主和文明的行动。中国现代作家如徐志摩、凌叔华、叶君健、萧乾等分别与这个团体的两代人有过交集。

③ 叶君健:《一代精英——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 页。

④ 叶君健:《我与儿童文学》,《西楼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 页。

⑤ 叶君健:《重返剑桥》,《重返剑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版,第 5 页。

⑥ [英] 迈克尔·斯卡梅尔:《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邵鹏健、李君维译,《读书》,1982 年第 5 期。

⑦ 叶君健在《啊,“这个英国”》一文中表示:“约翰是最初把我介绍进英国文学界的人,他在他所编的出色刊物《新作品》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当然,这要归功于我在武汉大学念英国文学时的老师和好友朱里安·贝尔。在我还没有到英国好早以前他就把我介绍给约翰。”(《重返剑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版,第 33 页)。

⑧ 参见[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年版,第 76、79 页。

界语写作,毕业后去日本教英文,却把自己描述为“坏学生”,这是“自嘲和谦逊的明证。而这种自嘲和谦逊一开始就使英国人感到亲切”。① 叶君健对这两位英国朋友讲述他和贝尔的友谊及在日本被当做无政府主义者而被捕的情况时,诙谐地说:“你不能太介意”,“如果我有时看来有点愚钝的话。要知道,他们经常打我头”。② 在西方人的眼里,羞怯或腼腆差不多是中国人的一个标记,叶君健也不例外,但这不妨碍贝尔与叶君健建立密切的友情,也不影响奥登和衣修伍德感受叶君健的魅力。很显然,叶君健幽默风趣的谈吐显现了他特有的人情味和亲和力。他以自嘲和调侃的方式解释他体验生活和介入政治的热情,为有兴趣了解现代中国的英国人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轮廓③,赢得了他们对一个中国年轻作家的尊重。如果说朱理安·贝尔为叶君健进入英国文化圈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那么叶君健的性情、教养、胸怀和智慧是他能够被那些英国友人认同接纳的内在因素。

由于叶君健是朱理安·贝尔的好友,在英国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再加上他无官方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份,1944 年他被挑选到英国,宣传中国盟邦在东战场上所取得的成就,以鼓励英国的战时士气。

叶君健到伦敦的第二天,《新作品》的编辑约翰·莱曼为初次见面的叶君健举办了茶话会,让他有机会结识英国的一些优秀作家。叶君健后来很有感触地回忆说:“参加了这次莱曼为我举行的茶话会后,我无形步入了英国的文艺界,从过去遥远的通信发展到随时可以见面,交换有关文学创作的意见的程度,这也是促使我用英文创作的一个因素。”④《新作品》对叶君健的意义,不仅仅止于连接叶君健世界语写作和英文写作的见证,它还是启发并激励叶君健改用英文创作小说的动力。1937 年,叶君健将他用世界语写的《王得胜从军记》翻译成英文,寄给了莱曼,小说很快即出现在《新作品》上,这是 Chun-Chan Yeh(叶君健)在英国文学刊物上的首次露面。这篇作品后来收进了 1946 年出版的英文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叶君健到英国后用英文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梦》,顺理成章地也刊载在《新作品》上。对莱曼的肯定和接受,叶君健的反应是:“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有几位朋友看到了这样具有中国战时生活气息的作品,觉得很新鲜,认为这正是战时英国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并且鼓励我再写下去。”⑤从《王得胜从军记》在《新作品》上亮相,至 1948 年《三兄弟》刊发于《新作品》为止,差不多有十年时间,英国诗人莱曼所编的这个丛刊,为着迷于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叶君健提供了难得的施展身手的平台。

叶君健与《新作品》建立较长久的关系,与其说是源于莱曼对叶君健的慧眼垂青,不如说是因为叶君健及其创作契合了《新作品》的立场和趣味。《新作品》“属‘现代派’的范畴。但这是转换期的‘现代派’”⑥。在这个丛刊上,叶君健的那些到过中国的朋友如贝尔和奥登、衣修伍德等都曾发表过作品。围绕这个刊物的人中有不少属于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的第二代成员。一方面,“这些作家和诗人,虽然都出身望族,但受了 1929 年在美国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恐慌’的震动,再加上法西斯兴起,都感到旧世界在崩溃,人类文明在毁灭,所以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都成了左派”⑦。他们不再沉迷于学术,“否定了田园式的文士生活,而走向十字街头,转变成为保卫文明和民主的战士”。另一方面,他们借助约翰·莱曼编的《新作品》,展开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丛刊的视野从英国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发表新秀的先锋派作品,同时也不时刊载其他地域年轻进步作家的创作”⑧。从这个丛刊的视野可见,围绕它的这群诗人作家已经摆脱了岛国的狭隘保守性,开始兼收并蓄,放眼世界。叶君健从他的老师贝尔那里接受

① [英]迈克尔·斯卡梅尔:《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邵鹏健、李君维译,《读书》,1982 年第 5 期。

② [英]W. H. 奥登、克里斯托夫·衣修伍德:《战地行纪》,马鸣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49 页。

③ 在 W. H. 奥登和克里斯托夫·衣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纪》文后是一组中国人和当年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相片,其中有一幅是叶君健,照片中的他着深色西装打黑白格领带,面带微笑,旁边的解释是“叶君健先生(知识分子)”。

④ 叶君健:《去国行》,《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2 期。

⑤ 叶君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 1 期。

⑥ 叶君健:《去国行》,《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2 期。

⑦ 叶君健:《陈西滢和凌叔华》,《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79 页。

⑧ 叶君健:《一代精英——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 页。

了多重的影响,包括积极行动主义、国际主义的实践精神,也包括那一代英国作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和把握。1936 年叶君健大学毕业后的日本之行,与 1937 年贝尔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前线以及与 1938 年奥登、衣修伍德到中国抗日战场巡礼,具有同样的意义:成为保卫人类文明和民主的行动者,因为他和他的那些英国同行们正共同遭遇了“一个政治与文艺相接合的‘时代’”①。叶君健积极投身现实的姿态在他的外语写作中也得以充分映现。

和贝尔对叶君健世界语小说的欣赏一样,可以想象,当莱曼读到叶君健从中国寄给他的《王得胜从军记》时,他一定从中嗅到了《新作品》文人圈所熟悉的那种气味。这篇从世界语转译过来的小说,冷静地叙写了一个破产的农民被迫从军的故事,披露了底层人的生活真相和精神现实。微讽的格调里融汇了作者对贫弱者处境的同情和对他们愚昧恶习的愤懑。叶君健并不擅长现代派小说常见的那种下意识的淋漓描述,但他透过一个中国农民荒诞无意义的人生写真,彰显出他的人性立场和文明意识的自觉,这应该是吸引并打动莱曼的地方。

叶君健到英国后尤其战后在剑桥的几年里,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②,虽然和这个群体中的两代人都有交往,但他在思想观念上与年轻一辈更为切近。叶君健解释说:“我与当时英国一些新派的中、青年作家有许多共同点,中国人民的抗战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以及英国人民在战争期间所遭遇的困难,是我们最初建立感情的共同基础,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③那一时段叶君健所写的短篇和长篇小说,继续借助于个人的乡村经验和中国记忆,为中国代言,只是意图更为明确:让英国读者了解同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梦想和行动。

《新作品》上刊载的叶君健第一篇用英文创作的小说《梦》和最后一篇《三兄弟》,讲述的都是唱戏的流浪艺人的故事。这些没有家甚至也没有故乡的人,他们热爱生活却颠沛流离、饱受践踏,仅有的微茫梦想在战争、饥饿和贫困的碾压下化为齑粉。除了叶君健有意识植入的普世价值理念外,他的小说能够抓住英国读者的就是中国情境,以及表现中国文化艺术趣味的独特写法。在国际视野的拓展方面,《梦》之类反映中国底层生活的小说显然符合《新作品》的标准要求。

自叶君健借助《新作品》在英国文坛打开局面后,一些英国的报刊和文学杂志的编辑陆续与他结缘,叶君健的作品先后出现在诸如《风车》(Windmill)《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现代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新政治家与民族》(New Statesmen and the Nation)等刊物上。叶君健也在各种文化活动中结识了更多的英国文化人,其中一些成为他过从甚密的朋友。置身在英国友人中间,叶君健感到并非完全协调,但还是为这些英国知识分子的情趣所吸引,对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抱有好感,也从他们那里增进了有关英国现代文学的知识和当时英国创作文风的理解,从而获取了发挥英语创作个人风格的启示,有时甚至直接得到写作上的具体指点和帮助。

战后进入剑桥大学英王学院进修的叶君健,有了较为安静的环境和相对完整的一段时间,他首先着手的工作是将之前零散发表在英国报刊上的短篇小说整理成集。1946 年包括了《王得胜从军记》在内的一些短篇小说以《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为名结集问世。英国作家和出版家组织的《书会》(Book Society)评选该书为当月英国出版的十本“优秀文学作品”之一,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出版并获得评论界的关注对叶君健是很大的激励。寻找出版机会的过程让叶君健明白,自己的小说也许与英国正统的美学观并不吻合,但还是可以吸引追求“格调多样化”的出版家的兴趣。而评论界赞许说“给英文的创作界吹进了一股新风”④,更是直接增进了叶君健英文创作的自信。《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为叶君健之后写作并顺利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山村》打开了通道,除了它们是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的外⑤,短

① 叶君健:《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 页。
② [英] 迈克尔·斯卡梅尔:《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邵鹏健、李君维译,《读书》,1982 年第 5 期。
③ 叶君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 1 期。
④ 叶君健自己的转述,参见《在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剑桥》,《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 3 期。
⑤ 伦敦的山林女神出版社(Sylvan Press)。

篇集中有几个小说的人物和故事还为《山村》提供了重叙、想象和发挥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不啻为《山村》写作的前期准备。几十年后,叶君健从读者的角度也同样肯定了那个短篇集对后来出版《山村》的意义:“那时我已用英文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在英国报刊上发表,接着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这样,我写长篇也有了社会基础。这个三部曲的头一部《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就是这样完成的。”①

为叶君健在英国文坛赢得最高声誉的作品无疑就是出版于1947年7月的《山村》。《山村》被英国书会评选为当月的“最佳作品”(Book Society Choice)。对叶君健来说,书会加印并包销二万册的奖励在经济上固然是极大的支援,而令他更为自豪的是,他终于成了英国权威组织认可的一个英语作家,获得了更深入地进入英国文化界的身份。作为一个外国人,叶君健显现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片段”,当然也主要取决于《山村》这部长篇的存在,而这部长篇的广泛影响事实上与英国书会的最初推介密不可分。《山村》在伦敦出版不久,纽约即印行了美国版。“此后这部小说就流行在世界各地,在欧洲大陆就有十四、五种主要文字的译本”②。随着叶君健1949年返回中国,《山村》的影响逐渐沉寂,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叶君健又重新出现在国际友人的视线里。1988年,距《山村》初版已41年,伦敦的费伯出版社(Faber & Faber)得知叶君健完成了名为《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的后两部后,将包括了第一部《山村》在内的三部长篇一同出版,1989年又推出了普及版。此后,《山村》又在希腊等国陆续出版了不同文字的译本,欧洲一度出现了“叶君健热”。

三

《山村》自出版后在英国、欧洲,乃至更广阔的世界“走红”,除了小说本身的价值外,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遭遇、中国人的生活,与英国以及世界上经受着战争苦难的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叶君健诚实的中国叙事,很容易激起有着类似体验的英国读者的同情反应,尤其是一些英国文化人,“他们迫切地希望知道中国乃至远东的战争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内部本身所面临的问题”③。而战后的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参与到国际事务中,逐渐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中国人的命运和前途、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在那些心系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眼里,就不再是与他们距离遥远的区域性问题。而对于叶君健来说,无论是30年代用世界语写小说,还是40年代在英国创作英文小说,都是在践行同样的使命:“帮助外国人民正确地理解中国。”④而《山村》这部长篇,按照作者90年代的回忆,最初的考虑尤为具体:“描绘出一个较生动的在中国农村所发展起来的革命图景,使读者能从中真正体会中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特点及其实际意义”,纠正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的误解。⑤ 事实上,《山村》并未直露地凸显这样的功利意图,但小说对中国社会大动乱现实图景的勾勒,对大动乱中农民的命运沉浮和心理变迁的展现,还是为西方读者暗示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方向。他们中很多人也许首先是被这本小说中的人和人的命运的故事所吸引,但《山村》“在无形中引起了他们对中国的革命的兴趣”⑥。至于像叶君健身边的英国友人那样对中国抱有好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当然会更有意识地在《山村》中找寻问题的答案。

自叶君健抵达英国那天起,他其实已经踏入英国那段历史的河流。他和他的《山村》以及其他英文

① 叶君健:《关于〈寂静的群山〉》,《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② 苑因:《关于〈山村〉》,叶君健:《山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
③ 叶君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④ 叶君健:《我与儿童文学》,《西楼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⑤ 叶君健:《在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剑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3期。
⑥ 苑因:《关于〈山村〉》,叶君健《山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小说在出现在英国受众面前,可谓适逢其时。叶君健把朱理安·贝尔等人漂洋过海亲自前往去体验和探索的地方,及时地用文字描绘了出来,铺展在那些愿意把目光投向东方的英国人面前。对叶君健来说,他创作英语小说是介绍和解释中国的职责所系,但置身英国文化和文学的包围中,他对中国的塑造和想象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英国的眼光及品味。而对西方读者而言,叶君健和他的英语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使他们可以亲临其境般地打量并了解中国,从中寻觅文化、政治、审美的新的发展可能。在这个层面上,迈克尔·斯卡梅尔称叶君健显现了“英国文学史的一个片段”,并非仅仅出于国际交流时的恭维,而确实是将客居英国的叶君健当成了英国的 Chun-Chan Yeh。

在叶君健们抵达英国的时代,一般的英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即便略知点滴,也是因为翻过一些“把中国说成一个稀奇古怪的国家,把中国人写成了荒谬绝伦的民族”①的读本。虽然英国人中也有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那样的,“她相信英国人‘骨子里流着和中国人同样的血液’”②,但这个比例之微是可以想象的。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在 1945 年认为“中国人开始被当做人类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③,这应该不是太夸张的说法。正因为对西方人的误解和偏见深有感触,叶君健才有意识地选择以轻松诙谐的笔触介绍中国,同时以中国人独到的人生参悟表现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同情,这不仅拉近了与他们的情感距离,更重要的是修正了西方读者的刻板印象。从世界语短篇《王得胜从军记》,到英语长篇《山村》《雁南飞》,其间彰显的人性之美,不仅交织着从容应对困境的睿智及理性,而且映现了对人类终究会消除隔阂、相互理解、共同战胜不幸和苦难的信心。这些作品触动了读者们最深处的情感和记忆,直抵人类精神的核心,因此它们不仅属于中国,属于英国,也属于整个世界。

叶君健回忆二战结束前对英国公众的巡回演讲时提到,他曾有机会与兵营的英国空军飞行员攀谈,得知他们习惯用“表演”来形容高危的出击任务,如若飞行员一去无返,同伴们则以“表演得不高明”(A poor show)来解释那次失误。叶君健感慨道:“表演”成了那些飞行员常用的行话,因为他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不带任何感伤情绪的平淡话语中体现出的是一种英雄气概,一种英国战时的士气。叶君健说他自己因此加深了对“在英国所作的这项战时工作的意义的理解”④。由于叶君健把他用英语面对英国公众的演讲也视为“表演”,所以,在他心里,他的工作虽不至于旦夕有性命之虞,可其重要性、挑战性与飞行员升空作战也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确实有学者指出,作家改变语言“最后可能会成功,但也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放弃母语、换而采用另一种语言,相当于一块一块地肢解你自己,然后再以不同的形式把你自己重新组装起来”,“你不仅凡事都得从头开始,而且还不得不取消自出生后就几乎一直在做的事”。⑤ 用第二种甚至第三种语言进行言说的局限在于其不自然性:须经历一个切换至非母语的思考过程,这也就在根本上决定了这种表达的“表演”特征。叶君健谈到早年用世界语写作时说:“这是一种人造语言,没有民族语言中那么多的习惯用法。我的思想得先在脑子里按照世界语的规范翻译成句子,然后讲出来—— 事实上我写和讲英文最初也是这样。久了,‘规范化’就在脑中成了一种习惯势力。这就使我运用语言的程序成为:思想——规范——语言的表达。”⑥叶君健尽管在后来找到了用英语写作的足够自信,但语言“‘规范化’的过滤”本身,无论如何都会造成深层表达的阻隔,而“文字上的瑕疵”则成为他时时需要提防的“本分”。一些叶君健小说的国内研究者注意到《山村》中的“欧化”痕迹,认为“国内读者读来有一种特

① 熊式一:《天桥·香港版序》,《天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4 页。

②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75 页。

③ [英]乔治·奥维尔:《评萧乾编的〈千弦琴〉》,左丹译,鲍雾编:《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50 页。原文刊载于英国《观察家》报,1945 年 11 月 11 日。

④ 叶君健:《去国行》,《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2 期。

⑤ [美]科斯提卡·布拉达坦:《在第二语言中重生》,笔者译,《纽约时报》2013 年 8 月 4 日(Costica Bradatan: Born again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New York Times* 2013 - 08 - 04)。

⑥ 叶君健:《作文》,《欧陆回望》,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01 页。

别有趣的'陌生效应',而西方读者接受起来无疑会有更多的亲切感"①。这种赞誉或许并非全无道理,但关键是这种语言的"欧化"是否真正契合作者意图呈现的中国人特有的感情气质,作者是否已将这种感情气质准确而圆融地转化为英语读者所能接受的相应形态。叶君健自己曾有过这样的反思:对西方文学的学习训练"使我对语言的运用、情节的安排以及感情的调节受到了限制。像斯坦贝克写《愤怒的葡萄》那样自由采用民众的口语,甚至俚语的酣畅写法,我完全无法做到,虽然我写的人物很多也是下层的民众——农民。我一下笔就被语言结构等问题所缠绕,行文总不是那么洒脱,丧失了一些自然、生动和形象化的东西"②。这当然是叶君健的自谦和自省,凸显了一位中国的英语作家令人尊敬的坦诚和理性。而实际上,其实没有人会苛求一个中国作家写出如《愤怒的葡萄》似的"纯粹的英语"的作品。

就像高明的表演者会利用自身与表演角色的距离,用自己的方式完美地诠释角色一样,一个穿越了语言疆界的优秀作家也必定会在非母语中找寻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正是因为叶君健对自己用世界语和英语创作的实际处境有清醒的认知,所以他有意识地将运用非母语写作的局限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借助于和第二/第三语言的距离,叶君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他的跨文化经验。他冷静而理性地反观自我及其存身的世界,发掘那些被隐去或被遗忘的生命真相,描摹出一幅幅令人信服的中国图景,使其具备了超越国界、超越族群、超越文化的意义,显现出迷人而恒久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山村》在时隔初版41年后的1988年由伦敦费伯出版社(Faber & Faber)为英国读者再次推出,并收获了如潮的好评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因此,相较于叶君健一生都敬佩不已的那些为和平而战的英军飞行员,用世界语和英语作品搭建了一座人类沟通理解的桥梁因而赢得国际声望的叶君健,作为一个高明的表演者,无疑同样值得所有为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懈努力着的人们的敬佩。

Performance in Cross - cultural Context: the Multilingual Writing of Chun - Chan Yeh

NI Ting-ting

Abstract: Chun-Chan Yeh chose to write in Esperanto and English in the 1930 - 1940s. His writing practice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determined his horizons of fusing "the Other" in such novels as the *Mountain Village*. Influenced by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Chun-Chan Yeh used his multilingual novels as a way of protecting human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 By virtue of performance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e multilingual works of Chun-Chan Yeh succeed to convey the Chinese voice to the world, providing readers with the possibilities of new developments of cultur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Key words: Chun-Chan Yeh; *Mountain Village*; performance; The Bloomsbury Group

(责任编辑:素微)

① 李保初:《日出山花红胜火——论叶君健的创作与翻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② 叶君健:《外国文学研究和创作》,《东方赤子 大家丛书 叶君健卷》,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③ 有关《山村》的书评除了可参见苑因:《关于〈山村〉》(叶君健《山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2684页)一文外,还可参见韩小蕙:《叶君健访谈》(《心灵的解读》,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在接受韩小蕙访谈中,叶君健提供了包括《山村》在内的《寂静的群山》三部曲于1988年出版后三周内英国出现的一些评论。